

# 第 14 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

韩 宇 李 莉

2007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 日, 第 14 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重点学科、《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和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协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40 名史学理论工作者参加了研讨会, 提交论文 36 篇, 会议围绕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历史哲学、史学流派与史学方法、史学理论专题研究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展现了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所取得的新进展。现将会议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 一、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

近年来, 我国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应用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指导性地位而言, 该领域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本次会议上, 一些学者就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展开了讨论。

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生产力、生产关系, 以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等唯物史观基本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他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解释范式做出概括, 即生产力与劳动分工的演化牵动生产关系整体发生变革, 而社会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着这种变革或迟或早实现, 由此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一级的演进。

郭艳君(黑龙江大学)探讨了唯物史观研究的微观维度及其当代意义, 指出马克思使哲学的研究对象转向了现实的人类生活, 而对现实的人类生活的研究, 始终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展开的。但由于马克思历史研究中研究的起点和叙述的起点不同, 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唯物史观的宏观维度, 市民社会史、日常生活史等微观维度却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李杰(云南大学)讨论了恩格斯对人类历史运动的形式认识问题, 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与自然界的不同的, 但由于人类行为的局限性, 人类历史却像自然过程一样运行, 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的历史, 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历史。人类只有摆脱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在社会关系方面从动物界中升华出来, 人类历史才能进入到完全符合人的需要的阶段。

董欣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和对世界史研究的意义进行了探讨, 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产物, 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形成和演变的内在规律, 为我们认识、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整体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 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实践意义, 同时为当代的世界史或全球史

研究和编纂提供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科学指南。

除了上述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理论的讨论外,与会学者还探讨了中国史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历史研究的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陈支平(厦门大学)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广阔空间和历史进程对“封建社会”这一历史时代名词的理论合理性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一词之所以成为“约定俗成”的时代名词,是因为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原理。在近代工业化之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欧洲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的发展水平基本相同,它们各自由此而产生的生产方式也理所当然地是在同一个历史阶段里,其社会本质是基本一致的。张剑平(河北农业大学)指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研究关系的重要思想,这主要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认真探讨中国历史的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格,在史学研究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盛嘉(厦门大学)认为,中国的美国史学者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中存在许多误读。他指出,由于马克思和列宁都以“独立战争”的格局来解读美国革命,中国学者也在此影响下采用“独立战争”格局来研究美国革命,这制约了中国学者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认识美国革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这种格局导致中国学者对美国革命中许多问题的研究存在简单化、公式化、要点化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全球范围内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介绍了俄国著名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普列汉诺夫的史学理论研究方法。他指出,国内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普遍采取三阶段法,即马克思主义阶段、机会主义阶段、背叛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阶段,这样的评价有许多问题,主要是由于史学理论方法论和史实上的原因。他认为新时代对普列汉诺夫及其评价的研究要有新的突破,除了理论层面的研究外,还应该关注、结合具体的历史问题研究。李桂芝(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60年代末出现的拉美解放神学在很多方面都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方法,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渊源主要包括:一、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改变了教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从对立改为对话,为二者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此后天主教徒可以合法地接触马克思主义;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三、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梁民愔(江西师范大学)回顾了东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兴起与发展,强调从“斯大林化”到“非斯大林化”的政治文化背景与从传统史学向战后新史学范式转换的西方史学学术渊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东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哲学基础、基本内涵、理论逻辑、官方意识形态立场和政治取向。王立端(福建三明学院)介绍了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史学家在书写“人民的历史”、加拿大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魁北克民族问题、劳工史和产业关系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形成了对加拿大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70年代中期以后的加拿大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劳工史、移民史、地方史研究和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 二、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是从事历史研究的重要指导,与会学者对该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深入

的探讨。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探讨了历史研究和民族精神的问题。他认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离开历史的现实存在,民族精神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载体。他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复杂形势,我们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中外历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庞卓恒(天津师范大学)对历史研究中的真理和规律问题进行了讨论。他指出,必须明确真理本是对事物本身具有的内在规律的认识,人们认识的规律实际上有两类:一类是“单层面”实证归纳性的“重复律”,另一类是把“因”和“果”两层面的事实联系起来归纳得出的“因果律”。前者只具有或然性,没有普遍的因果必然性,后者才具有普遍有效的因果必然性。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普遍有效的因果必然性规律。

张文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讨论的是20世纪西方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他认为,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兴起,一方面批判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另一方面将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从解释历史的性质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来。这极大地推进了史学理论的发展,也为历史学确立了更为稳固的根基。

周建漳(厦门大学)论述了历史存在的故事性,指出人类生活的历史世界是否具有如叙述文本所呈现的故事性样式,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理论问题。他认为基于叙述理解与实践互动间的互动关系这一根本理由,关于历史潜在地具有故事性结构的主张可以获得正当的理论辩护。林璧属(厦门大学)讨论的是关于历史认识科学性的问题,认为历史认识的科学性不能仅仅从其是否发现规律和是否采用自然科学方法作为判断依据。他引入历史认识的层次性概念,以可检验性这一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主要评价依据为标准,认为历史认识具有可检验的科学特征,亦即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判断,历史认识是科学的认识。

姜芄(中国社会科学院)探讨了自然环境和文明起源的关系。她首先对自然环境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界定,随后从文明的起源与纬度、气候、地貌与生产方式的关系,地理位置与文明融合的关系以及地理环境与人类的相互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对西方近代以来的一些学者有关地理环境与文明的关系的理论进行了介绍和评价。

### 三、史学流派与史学方法

关于史学流派与史学方法的讨论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与会学者除了对中西史学史上重要的史学流派和史学家进行分析和探讨外,还在史学方法论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德国史学的发展在本次研讨会上受到了较多的关注。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评点了德国学者科卡的《社会史》一书,认为从此书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战后德国社会史的发展脉络。科卡承认并积极吸收来自于批评者的有益成份,努力使德国社会史在继续重视历史社会的结构和进程的基础上,结合文化因素而得到充实和完善。科卡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社会史研究还应该重视历史上具有跨民族、跨国界意义的社会现象的研究。景德祥(中国社会科学院)关注的是纳粹时期德国史学,讨论了德国史学与纳粹政权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1933以前,德国历史学家中很少有人直接支持纳粹党,但是他们对魏玛共和国的攻击在

客观上为希特勒上台制造了舆论。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分子对史学界的冲击虽然取得了一些表面的成绩,但未能在指导思想、研究机构与人才选拔上对传统德国史学进行根本的改造。赵进中(北京大学)从德国历史哲学的角度探讨了德国公民社会的理论思想,对其最新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对公民社会的定义。

与会代表对新的史学流派进行了分析。陈新和黄红霞(复旦大学)探讨的是后现代主义与公共史学的兴起,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为历史学带来了一场范式革命,它倡导保持差异的多样化历史写作,一旦公众将研究历史与写作历史当作一种乐趣时,也就开始瓦解职业历史学的权威性。这种情形与新媒介相结合,必将促成公共史学的兴起。徐善伟(上海大学)阐述了想象史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及其具体应用,认为想象史既是对中国传统的“以文证史”方法的继承,同时也需要结合当代西方想象史的研究加以发展。想象史奠定在历史学与文学、语言学、艺术的相互交叉上,而建立在历史现实基础上的想象和想象中的现实则为想象史提供了理论依据。许二斌(厦门大学)介绍了“新军事史”在西方史学界兴起的情况,指出不以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为目标,而以探讨战争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宗旨,关注焦点从战争本身转移到战争以外,其研究者多为没有军事经历的专业历史学家,是20世纪后期西方史学界兴起的“新军事史”的特点。“新军事史”的兴起弥补了传统军事史的某些不足,但它不会完全取代传统模式的军事史。杨祥银(温州大学)介绍了近代香港医疗、疾病与卫生史的研究状况,指出现有研究成果中不乏很有创见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但大部分研究都是一些编年史叙述和纪念性文字,又或者是一些个人传记,未来香港医疗、疾病与卫生史的研究仍有相当广阔的空间。

与会学者还介绍、分析了中外一些著名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和方法论。庞天佑(湛江师范学院)将南朝著名史学家萧子显的史学方法论概括为三个层次:一是以整合的系统的思维方式,对历史过程进行宏观思考与系统认识,考察历史的发展与演变;二是以归纳法总结人物的共性,以比较法考察人物的个性,在共性概括中寓含个性总结,在个性揭示中体现共性探讨;三是以同类带叙法附载与传主同类的人物,以综合概述法记载有关人物的生平事迹。张文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对顾颉刚和E. P. 汤普森这两位在中国与西方史学史上有很大影响的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与方法进行了比较,认为他们都是由实证研究而成为史学理论流派大家的学者,在史学方法与历史观层面有诸多相似之处,而且都较好地处理了学问“真”与“用”的关系。刘永华(厦门大学)关注的是美国著名史学家娜塔莉·Z. 戴维斯的史学方法。他首先回顾戴维斯的主要史学著作,然后分析戴维斯在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叙事三方面的成就,最后讨论了戴维斯与后现代史学的关系。

在史学方法论方面,周一平(扬州大学)以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为例,强调了在历史研究中应用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他指出,单纯应用政治理论研究中党史、国史已不够用,应学习、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这样才能开创研究的新局面。曾玲(厦门大学)以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账本为个案,探讨了华人社团经济资料在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中的重要地位。福德祠绿野亭的账本,是考察移民时代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帮群社会的建构与演化的珍贵的文本记录,对讨论闽粤移民的社群整合与华人社会建构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林枫(厦门大学)则以

傅衣凌先生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及15至18世纪中西公共部门效率职能的讨论为个案,探讨了中西比较方法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应用,指出此方法将有助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深耕拓宽,尤其是宏大视野的形成。

## 四、史学理论专题研究

与会学者还对历史研究中的一些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刘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探讨了西方经济民主观念的问题。他指出,产业民主与经济民主有密切的关系,产业民主是经济民主的核心部分之一,也是经济民主的一种具体表现。产业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在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以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虽然80年代新保守主义社会思潮使这一进程出现曲折,但西方社会既然对政治民主的追求未变,也就不能抛弃经济民主。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指出,许多资产阶级革命者按照现代的标准都应界定为“反革命”,这说明革命这一概念的界定不应该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革命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仅凭单一的模式去解释。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为切入点,探讨了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文化、权力等问题,认为在对世界历史做出理解时,既要看到全球性力量是如何给地方带来巨变的,也要关注各种地方性力量是怎样共同促成这一变化发生,以及它们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章益国(上海财经大学)就“东亚现代性”思潮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该思潮试图颠覆早年现代化理论中“现代化等于西化”的图式,冲击了“单一现代性”的认识,加深了对现代性的西方模式的批判,为反思西方现代性提供了一个外部支点。但其挑起的“文化与现代性”的“一多之辨”、“同异之争”,也陷入了一些逻辑陷阱。

城市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也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王旭(厦门大学)指出,传统城市化理论需要修正,现有的城市化理论过于强调人口的集中和城市数量及自身规模的扩大,主要适用于阐释从城市发展的初期到中期即城市化由发生发展到初步完成阶段的基本规律和问题,无法解读城市发展高级阶段的很多问题。我国现有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导致巨大的城乡差异,更需要在城市化理论方面的突破,为城市发展战略和政策抉择提供理论依据。韩宇(厦门大学)就美国高技术城市的概念以及相关理论展开讨论,认为在我国学术界通行的将高技术产业区称为“开发区”或“园区”的作法存在明显的缺陷,极易产生对于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区空间范围的错误认识,特别是“园区”的称谓与科学园区的概念相混淆,因此应采用“高技术城市”或者“高技术大都市区”的概念。

(作者韩宇,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莉,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邮编:361005)

(责任编辑:董欣洁)

(责任校对:张旭鹏)